

# 抗战时期人口西迁对西部地区 社会生活的影响

张根福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抗战时期的人口西迁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衣食住等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革; 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变化明显; 妇女地位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 民众的地域观念逐渐淡化, 民智民风得以开启。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人口迁移; 西部地区; 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 K 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260X(2007) 06- 0147- 07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在这场战争中, 华北、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等地的一些省市相继沦陷或成为战区, 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为避战祸和自然灾害被迫进行迁移。据估计, 战时迁入西南地区的人口约 300- 400 万, 迁入西北地区约 300 万。他们主要分布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及一些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与交通沿线, 其他区域也有零星分布。

目前, 学术界对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已展开初步的研究, 徐杨、李云峰、刘俊凤、张成洁、莫宏伟、朱丹彤、徐晓旭、艾萍等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成果。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 从抗战时期人口西迁对西部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本文的西部地区是指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康及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 一、生活方式

抗战时期, 随着大批人口的西迁, 尤其是国民政

府、工商文教团体的西迁, 使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城市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衣食住等生活方式的变革, “这些变革, 最终影响了西南市民平和、宽容的社会心态的形成, 在西南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sup>[1]</sup>

### (一) 饮食

抗战期间, 全国各地的名厨大批迁入西南各城市, 广东的冠生园、大三元, 苏州的陆稿荐, 江浙的状元楼, 湖北的四象村等外地人经营的餐馆纷纷开张, 粤菜、湘菜、浙菜、京菜、苏菜、鲁菜等菜系相继进入, 大大丰富了西南地区的饮食文化。当时的贵阳, 各种风味的餐馆鳞次栉比, 滇菜的缘鹤村, 粤菜的岭南楼、珠江酒家、南华酒家、广东酒家, 川菜的豆花村、会仙楼, 北菜的天津餐馆、北味村, 黔味的中和天、天顺园等应有尽有。西餐馆、咖啡厅也大举进入西南, 如重庆, 西餐馆从抗战初期的 5 家, 增至 1943 年的 30 多家<sup>[1]</sup>。在成都, 战时餐馆发展到 3000 多家, 平均 130 个人就有一家。粤菜馆“津上”和供应广式早茶早点的“冠生园”, 江浙风味的大可楼、四五六, 北方菜馆“明湖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设的。对外来风

收稿日期: 2007- 09-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与西部开发”(01CZS008)

作者简介: 张根福(1964—), 男, 浙江浦江人,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近代史研究。

味、餐饮的喜爱,已成为战时西南城市饮食习惯的一个重要特色。如重庆沙坪坝地区食俗有较大变化,“早上吃干饭的人日少,代之以豆浆、油条、点心,学生早上吃稀饭,中晚两餐仍食大米饭,也有的吃面条的。场镇上除川菜馆外,还有江浙馆、广东馆、北方馆,饮食结构趋于多样化。”<sup>[12]</sup>(P855)与不同地域民众生活在一起,西南部分地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以昆明为例,战前昆明人无论城乡每天只吃两餐,分别在上午9时和下午4时;抗战以后变成了每天三餐,这倒不是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多半只能说是生活习惯改变了<sup>[13]</sup>(P314)。

在西北地区,虽基本沿用原来的饮食习惯,但随着战时西北的开发和人口的迁入,传统的饮食结构和习惯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譬如,西餐开始传入西北地区,在一些沿铁路新兴的城市和各省的省会城市,各种经营西式面包、糕点和饮料的食品店、糕点店与各式传统食品店一起丰富了人们的饮食。又如,随着战时人口的迁入,各路菜系在西北地区聚集并相互交融,当时的西安,京菜、川菜、粤菜、清真菜均相当有名<sup>[14]</sup>。与此同时,具有各种地方特色的小吃店、小饭馆也纷纷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不在家中用餐,大饭店、酒楼、小饭店、工厂食堂成为不同职业和阶层人们就餐的场所。

## (二) 服饰

战前,西南地区的服饰比较简单,常见的是内穿短褂,外着右襟长衫,下为长裤,以蓝色、青色和灰色为主。如成都,“因交通不便,对于京沪流行之时装,鲜少接触。故男女服装,多以布为原料,男常着海昌兰布或灰色布,女常着阴丹士林布,朴素之风亦自可尚。”战时,迁移人口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美丽、方便的装束促使西南民众纷纷效仿。在成都,“省外人士来蓉日众,西服旗袍时时翻新。成都人性固乐新异,男女服装遂日新月异,今昔相较,迥然不同。一般时髦仕女,亦有以电影时装姿为楷模者,服装更不统一。”<sup>[15]</sup>(P144)据郭视崧回忆:战时成都华西坝集中了较多的内迁者,从而带动了成都市民服饰的变化。其中最瞩目的自然是女大学生,只要有位女大学生穿出一种新服,第二天就会在同学中出现复制品;再一天,市民中也必定有了。而且彼此争奇斗艳,几乎天天更新<sup>[16]</sup>。在昆明,人们普遍以西装为新潮,“瓜皮小帽,现在普遍以毡帽来代替了,棉布鞋以皮鞋来代替了,女子和妇人因山野间的鲜花得来容易,故再也不用人工制造的花来装饰了。”<sup>[17]</sup>(P17-18)在贵州城镇,

外来者所穿的长袍马褂、中山装、旗袍等也逐渐被当地人所接受。浙江大学迁黔女生虽不多,但“她们服饰朴素,四季蓝布旗袍,或工装打扮,青鞋白袜,衣裳整洁。这种装束典雅大方,在湄潭颇为时髦,当地青年妇女仿而效之,也逐渐摩登起来。”<sup>[18]</sup>在西南其他城市也是如此,“男子穿长袍者渐少,留‘东洋头’;着淡灰色布料中山服者日众,冬季多穿皮西装,博士帽也随之流行。城镇妇女穿旗袍、戴戒指、金圈、玉镯,长袜皮鞋,短发戴帽,并饰口红、香脂……各种时髦妆扮也不时出现在西南各城市的街头。”<sup>[19]</sup>

在西北地区,战前,“一般民众不分男女均为上袄下裤,袄分为对襟、偏襟、大襟,裤则多为长腰、宽档,裤腿处或较窄或另以布带裹束,以取其保暖好、起蹲方便的实用效果……服饰的颜色以蓝、墨、白为主色,多由家庭土染而成。”<sup>[14]</sup>在人口迁移浪潮的推动下,西北地区的服饰也出现较大的改观,“中西合璧的新式服装——中山装,不仅成为公务人员的普遍穿着,更在中学生、知识青年中广为流行;女学生们则青睐于满族原来的服饰——旗袍,亦成为西北地区城市青年妇女的‘时装’。在一般市民的穿戴中,工人服、两用衫、夹克衫也纷纷出现。除此外,对于传统服装,人们也在悄悄地吸收西式服装的特点进行改造。”<sup>[14]</sup>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和商人,也穿起了西装,少数民族的一些服饰习惯得到改良。

## (三) 居住

与战前相比,战时西部地区在居住方面的变化,虽不及饮食与服饰的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一是兴建了一些西式楼房和新式住宅区。伴随国民政府的迁移,大批军政人员、文教、工商人士也随之而来,在陪都重庆及一些西部的城市都出现了一些新式住宅。如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政府机关及市区人口疏散至歌乐山、青木关及北碚之间,并定此地区为迁建区。在此修建了不少国民政府及各部官员的高级住宅区,如嘉陵新村等。在昆明,对旧城进行了改造,“(街道)两旁的建筑相当的现代化,入夜霓虹灯照耀着,无线电收音机广播着各种音乐歌唱。这一切的声色以形成昆明为西南边疆的大都会,当无愧色。”<sup>[14]</sup>同时还兴建了篆塘新村、靖国新村、吴井新村等新型住宅区。在西北地区,“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平静、封闭、分散、亲土而又落后的农村文明下的生活居住方式,却被火车的轰鸣、汽车的急驶以及纷沓而至的商行、银行、机关、学校、工厂企业所打破。新式的以钢筋、水泥为材料的建筑物在

铁路所到之处渐渐竖起。在一些城市,逐渐出现了新居住区,其中多为官僚或资本家所居的新式洋房和豪宅。<sup>[14]</sup>这些西式楼房的新式住宅主要集中于城市,在广大的农村,传统的民居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二是伴随大批难民的迁入,各种临时房子,简易工棚随处可见。以重庆为例,各迁渝单位或租赁房屋或新建房棚,城市规模迅速膨胀。旧城区、新市区的旧有空地和化龙桥、土湾、沙坪坝、小龙坝、海棠溪、龙门浩、玄土云庙、弹子石及江北老城、溉澜溪、陈家馆、香国寺、猫儿石一带,各种简易房屋、厂房、工棚拔地而起<sup>[9]</sup>。重庆磁器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房屋除旧式木壁砖墙屋、旧式普通木架屋、新式别墅、棚户、船户外,抗战中临时建造之房屋,“以结构论,有下列数种:(1)捆绑竹木架,屋顶为茅草或单层瓦顶;(2)木架竹篾墙,多采用近代小住宅式,为较优之铺房及住宅所通用者;(3)砖柱土墙,多仿钢筋混凝土之结构装潢;(4)钢筋混凝土架,为数最少;(5)阁楼。在木架屋之上或下,再架新屋,横枕竖梁,捆绑排列。<sup>[10]</sup>这些简易房子的出现与难民的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二、婚姻生活

中国的传统婚姻向来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三从四德”等严重束缚着妇女的命运。“五四”运动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新的气象,但在闭塞的西部地区却未能激起大的涟漪。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给西部地区提供了新的机遇,“新式学校内迁及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开放的现代文化风气,大量宣传婚姻自由的书籍报刊被介绍到西南,教授也在大学讲台上引导学生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抗争,校园内男女同学自由广泛地自然地交往,已成为普遍性的常事。这种新气象、新观念给西南人极大的震荡。<sup>[11]</sup>西部地区的婚姻观和婚姻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一) 婚姻圈的扩大

由于交通的闭塞和经济的不发达,战前西部地区民众间的交往及通婚半径非常有限,婚姻圈通常稳定。战时大规模的人口西迁,增加了人们接触的机会,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也有利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而使西部地区民众的通婚范围大大拓宽。在西迁人口中,以男青年居多,不但迁移人口互相通婚

极为普遍,与迁入地女性结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正像美国作家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所写:“北平籍的男孩子与四川籍的女孩子结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儿嫁给了广东人。”<sup>[7]</sup>(P18)在云南,自滇缅公路开放,数以千计的公家及私家大卡车从事运输及做出入口生意,汽车司机“大约65%是和云南女子结婚的,而大多数属于初婚。在这些家庭中,从妻子方面很容易见出本地的社会风俗。”<sup>[12]</sup>(P97)

其他类似情况尚有很多,“于是本地居民与移民间接接触渐多,感情渐洽,不知不觉间渐渐互通婚姻,使我国东部与西部人民间,血统上发生融和的现象,此乃大移民必然的结果。”<sup>[13]</sup>(P264)通婚圈的扩大,有利于血统改进,对提高人口素质也十分有益。

### (二) 婚恋自主性的提高

战前,西部地区女性的地位低下,无自主婚恋可言,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战后,一方面由于西迁的单身者远离故乡,在战争环境下,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家庭对其婚恋的干涉,自由恋爱占有很大的比例;另一方面,西迁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对迁入地的婚恋观转变起很大的作用。如广西,当地“平素束缚已惯的妇女,看见疏散而来的妇女生活,也慢慢觉得男女原应该自由平等的。”<sup>[14]</sup>在当时西部的主要报刊都刊有相似的结婚启示:我俩情投意合,经双方家长同意,兹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结婚。因抗战期间,免除一切仪式<sup>[14]</sup>。追求婚恋自主反映妇女追求个人幸福,要求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个性意识的觉醒。

婚姻自主还表现在解除婚姻的自由度增加。传统中国极为重视婚约,离婚往往受到民风的谴责,被视为不齿行为。为此离婚案的出现和上升,意味着人们突破传统婚姻束缚的勇气和追求自由婚姻的向往。战时,西部地区随着婚恋自由度的提高,离婚率也有所上升。据统计,1939年昆明市受理的离婚案仅8件,至1944年上升至541件<sup>[3]</sup>(P320)。

1934年,广西各地法院填报的31县共受理离婚案件746件,到1941年上升为1033件<sup>[15]</sup>。另据朱丹彤对《大公报》自1939-1945年刊登的离婚启事的统计,1937年重庆离婚案只有17起,至1943、1944年,分别达到265起和244起<sup>[16]</sup>。离婚的原因中除妇女没有生育、虐待、遗弃、重婚等外,意见不合、反对包办婚姻占有主要比例。在战时的西南,“妇女婚姻不幸可以请求离婚,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西南人民开始意识到,包办婚姻造就了女性的不幸。”

[11]在西北地区,受外迁人口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要求解除包办婚姻、追求自由婚姻的现象,如民风淳朴的同官县,“近来教育发达,女权渐伸,离婚案件已开端倪。”[17]离婚率的上升是衡量战时西部地区婚姻自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 (三) 婚姻习俗与形式的变革

战时人口迁移对西部地区的婚姻习俗与形式也起了改良的作用。如重庆沙坪坝地区,战前“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嫁娶几乎全沿旧习。”抗战开始,“下江人大量涌进沙坪坝地区,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农村中的包办婚姻逐渐减少,婚礼也化繁为简,只保留了‘六礼’中的纳吉(即订婚,民间叫‘插香’)和亲迎(即结婚,民间叫‘做酒’)两项。在城镇,大多是自由恋爱,文明结婚。婚礼分为订婚和结婚两步。”[12](P853)又如云南某地婚俗,举办婚礼后,主人必邀亲朋好友叙宴3天,而当地的两个当兵的人回家,受他地婚俗影响,把婚礼宴客减至3顿[12](P96-97)。

一些年轻人放弃了传统的结婚仪式,采用新式婚礼、集体婚礼形式。如成都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规定:“第一条,本市为推行新运提倡俭约起见,举办集团结婚;第二条,本市市民举行结婚,须申请参加集团结婚典礼;第三条,本市集团结婚典礼,每年于春夏秋冬四季,各举行一次,由市长证婚;第四条,参加者每对应缴法币五十元……”[19](P100)重庆、贵阳等地的集团婚礼也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1940年,重庆举行过三届集团结婚,有62对新人参加;从1941年到1943年,贵阳共举办四届集团结婚,共35对新人参加。参加的人数虽有限,但它毕竟说明新的婚礼习俗在西南被人们所采用。[1]集团婚礼隆重而简单,礼节无非是鸣爆、奏乐、唱国歌、鞠躬、致词等,不但可节约婚礼开支,而且大大增加喜庆的场面,受到新派男女的欢迎。

## 三、妇女地位

中国的妇女运动虽发轫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传遍全国。但至抗战前,因“数千年来,妇女界本身之自觉仍嫌不够,而社会传统旧习俗积重难返,妇女运动实际的成就仍是如此的微小。”直至抗战发生,“由于战争洪流的激荡,不独妇女本身有了深刻的惊觉,就是有朝野人士,对于妇女的责任与能力,也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与估量,中国的妇女运动才真正走上了建设的道路,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也从

而步上一个新的时期。”[18]战时大批人口,尤其是高校师生的西迁,推动了西部地区文化教育的开展,民众的视野得以开阔,社会风气日趋开化,妇女地位得到较程度的提高。

### (一) 妇女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在内迁文化人的主持或推动下,西部地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婚恋自由的书籍相继问世。8年中出版的妇女刊物就有:《妇女共鸣》、《妇女生活》、《妇女文化》(战时特刊)、《妇女新运》、《妇女工作》、《中国妇女》、《妇运月刊》、《妇女新运通讯》、《广西妇女》、《中国青年》、《时代妇女》、《妇女之路》、《云南妇女》、《中国妇女》、《新疆妇女》、《妇女工作》、《家庭妇女》、《妇女园地》、《现代妇女》、《妇女合作运动》、《职业妇女》、《妇女与儿童》等。出版的有关妇女问题及工作的著作有:《战时妇女动员问题》、《宪法实施与妇女》、《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战时的妇女工作》、《大时代的妇女》、《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妇女问题丛书》、《怎样动员妇女》、《民族抗战与妇女的任务》、《战地妇女工作》、《新妇女生活讲座》、《唯物恋爱观》、《女权论辩》、《婚姻问题通讯集》等[19]。这些书刊对启迪民智,转变西部地区的女性观念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时大批内迁人员和学生,深入街头巷尾、工厂农村,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与动员,争取妇女的自由与解放。加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涌入西部,“她们观念开放,衣着现代,言谈举止文明,使长期受旧礼教束缚的西南妇女,看到了一个崭新而多样的世界,感受到文化上的强烈反差,耳濡目染,于是也要求平等,倡导教育,追求社会参与……掀起了一场妇女解放的潮流。”[11]一些封建的观念与陋习,如“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许多妇女开始认识到自身的地位与价值,增强了时代的使命感,从而将自身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政治参与意识大大增强。

### (二) 女子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与识字率的提高

大批内迁学校都吸收了当地女子入学,各类女子学校也相继兴起,内迁学校的社会教育如女童识字班、妇女补习班、扫盲教育班如火如荼,女子入学读书在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成为普遍现象,部分偏远山区也习以为常,从而使战时女子受教育程度得

到明显提高。如贵州省,战前仅有私立大学1所,专科学校1所,高级中学5所,战后“迁入或设立者如雨后春笋,文化提高实有俾助。本省识字人口据廿八年统计有939309人,内男子识字者820030人,女子识字者119279人。”<sup>[20]</sup>另据张成洁等人的研究,贵阳市,1937年识字妇女为4962人,占妇女人数的7%左右,至1942年底,已增至20716人,识字率达24.6%,同战前相较,提高了3倍。其中接受初中教育的妇女达5195人,占妇女总数的6.2%,接受高中教育的为2207人,占妇女人数的2.6%,接受专科以上教育的为419人,占妇女人数的0.8%。昆明市妇女,1937年识字人数为12831人,识字率占24%,而1944年则增至38528人,识字率达90%,其中接受初中教育者为27552人,占妇女人数的60%以上,接受中学教育者达7142人,占妇女数的17%,接受高等教育者180人,占妇女人数的4%。四川女子受教育程度高于滇、黔两省,1946年,四川受中等教育者为248017人,其中女生占70447人,超过1/3<sup>[11]</sup>。

### (三) 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工作的女子增多

“七·七”抗战开始,“全国妇女已是很英勇的和男子站在同一立场上担任着艰苦的工作,不论在前方后方,不论在保育、慰劳、救济、募捐、看护、医疗、教育等工作中,以及在工业、农业各种生产部门方面,妇女们都表现出相当的成绩。”<sup>[21]</sup>在西部地区,受内迁职业女性的示范影响,许多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据统计,1945年,重庆市从事农业的妇女有38522人,占妇女人数的7.7%,从事商业者为87809人,占17.6%,交通业者为7644人,占1.5%,公务业者为35001人,占7.0%<sup>[11]</sup>。1944年初,昆明市从事农业的妇女为655人,占妇女人数的1.8%,工业者6296人,占17%,经商者4858人,占13%,交通运输业者3129人,占9%,公务业者2698人,占7%。无业妇女仅占9%左右<sup>[22]</sup>。

在西北地区,不少妇女也开始摆脱对家庭的依赖,投身到各项社会工作中。西北作为羊毛之乡,“过去手工编织物也都是男人的事”;战后,妇女加入进来,“她们从最落后的环境里,走到工业的最前线。”<sup>[23]</sup>“甘肃的广大妇女,也正在向这条路上发展。工合每年度的百万条军毯运动,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是靠着成千妇女的手脚来完成的,无论老幼都愿意来参加纺毛工作,比较艰苦的弹毛的一部分,也有女工参加,她们并经常和男工举行着工作竞赛。”“假若说小脚肮脏而懒,应该怪过去没有人好好领导,这优异

的成绩,已充分表现了她们能力。”<sup>[23]</sup>

甚至,一些繁重的工作,如修筑铁路、公路等,也由妇女来承担。如,“湘桂铁路的筑成,是五万以上湘西南农妇的殊勋。甘川公路是中国妇女的新光辉,她们已将甘肃省内最艰难的一部分,就是横贯岷山木塞岭的一段完工了,全程计一千四百华里。岷山前线,三、四里的崇山峻岭,过去许多勘测的工程师,都感觉很棘手,但是岷山县的妇女,毫不疑惧的将它开凿并且已克服了困难而告竣工了。”<sup>[24]</sup>滇缅公路和西北通往苏联的公路,即“战斗中国在海岸遭日本封锁后积极开辟的两条对外交通线——大部分是由女工完成的。”<sup>[25]</sup>妇女就业面的扩大,意味着妇女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家庭的依附关系,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既有利于女性自身主体地位的觉醒,也有利于社会重新认识女性权利及价值,从而导致更深层次的女性观念的现代化。”<sup>[11]</sup>

## 四、民众意识

战时的人口迁移对西部地区地域观念的淡化,民智民风的开启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一) 地域观念的淡化

战前,西部地区因幅广阔,民众多安土而重迁,“平时除极少数经商游宦求学作工等人外,其余大都不出乡关,与外省人接触既少,地域观念自必甚深。无论在工商教育政治等各方面,可以发现‘此疆彼界’的限制极严”。战时大规模的人口西迁,使得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口与西部民众有了广泛的接触机会,“一则安土重迁的人民,不远数千里跋涉而遍历风土人情大不相同的各城市乡村;一则从未出乡的居民,得见来自各地风土人情大不相同的人民,而与之发生各方面的接触,如此交互影响,不仅可以增加双方人民的见闻交际,而且可以渐渐破除历来根深蒂固的地域观念。”<sup>[13]</sup>(P264)

譬如,从前四川人称呼外省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与人谈话,多以“老子”自称。抗战开始后,大量外省人入川,其经济力量雄厚,文化也较发达,他们将江浙沪一带为中心主流文化传递至四川,使得重庆市民受外来影响,渐染渐深,无论饮食、娱乐、商业、市容、建筑、交通、习俗、观念、行为习惯等,无不渐趋于“下江化”。从社会底层激起对外部现代因素的向往与认同,这也成为当时整个大后方的一大特色<sup>[26]</sup>。真像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中所写,“自去年

十月起,脚底下人与脚底下货,充溢重庆市上。市招飘展,不书南京,即书上海。而小步五支衢头,南北方言,溢洋盈耳。客主之势既移,上下江之别,殆亦维持不易矣。<sup>[127](P45)</sup>

此外,人口迁移也促进了不同地域语言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它不但使内迁人口的语言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如不少家庭,“孩子长大,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sup>[17](P17)</sup>,而且更使当地方言受到外来语言的冲击,在一些偏僻的山区也是如此,如在云南,一部分流亡来滇的西南联大学生来到荒僻的路南县尾则地区开展社会工作,到后来,这里的“好些夷胞儿童都会讲汉语了。”<sup>[13](P315)</sup>不同地域语言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众间交往的障碍,冲击了西部地区的方言体系,从而也起到淡化地域观念的作用。

## (二) 民智民风的开启

人口迁移对西部地区的民智民风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黔省文化水准,较东南各省为低,抗战后文物西迁,渐臻发达。”<sup>[120]黔北在贵州虽属较好的地区,但在20世纪40年代仍非常封闭,对现代科技知识很少触及。浙大师生的到来,“使当地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sup>[128](P37)</sup>当时,遵义百姓尚不知“电”、“引擎”为何物,浙大工学院便特地在遵义展出飞机残骸和电话、电灯、发电机等,并现场表演电焊及土木工程方面的拉力、压力等实验,起到了启发民智,普及现代科技常识的作用。浙大严谨刻苦的学风在当地产生深刻的影响,“遵义青年以往常以经商、做小职员、当兵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的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sup>[128](P38)</sup>遵义居民“原有一些不良习俗,烟民较多,身体孱弱”,竺可桢校长曾亲自组织学生为贫苦烟民戒毒募集经费而义演。学校还与地方政府合办一所戒烟处,免费为穷人戒烟,“使地方卫生院顺利推行戒烟令,对移风易俗、戒绝恶习起到良好的作用。”<sup>[128](P41)</sup></sup>

广西不少地方因交通闭塞,与外界缺乏交流,地方观念根深蒂固,存在着客人仇视土人,土人仇视客人的状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大多数人中广泛存在,械斗之争层出不穷,“每以小事酿成大祸不止,家败人亡不止。”<sup>[129]</sup>战时大批人口的迁入,使外地民众与本地居民有了广泛的接触,文化得以交

流,观念也得到较大的改变,“相互从疑惧对抗到了解融合,本地居民逐渐打破了乡土观念壁垒,放弃了顽固的地方观念。”西部一些封闭落后的地区,战前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随着人口的迁入,特别是一些高校的迁入,使落后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如国立剧专迁到江安时,江安还是一个弥漫着封建思想的落后小城,学生读书历来是男女分校,看到剧专的男男女女学生同学习、同歌舞、同上街,夏天还同江游泳,江安人始有微词,天长日久即见惯不惊了。

人口迁移还使西部地区的一些陈规陋俗得以革新。正如近代社会学家孙本文指出的那样,东部各省人民移入西部,“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褥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或可得合理化或简单化的机会。”如重庆的浴室,在战前“每家浴室均有家庭间,携着同浴,固属正当。召妓戏谑,亦非所忌。”<sup>[127](P46)</sup>战时受东部民众思想的影响,重庆居民认为此举有碍风化,不合礼数。1939年3月,重庆警察局发布公告,取缔男女同浴的风俗。又如,交谊的礼仪,重庆沙坪坝地区战前“农村中仍行拱手礼,磁器口等商业发达的场镇受外来风气影响,逐渐代之以鞠躬礼”,“亲族往来,同辈相互行拱手礼;幼辈见尊长则幼辈先作揖或行鞠躬礼,尊长颌首还礼。远出或远归,幼辈向尊长行跪拜礼或三鞠躬礼。”抗战期间,大量人口迁入沙坪坝地区,“人际交流频繁,握手成了最时兴的社交礼仪”,“跪拜、作揖、拱手在农村的部分人中还保留着,在城镇几乎全部废弃。鞠躬礼也大大减少。”<sup>[129](P854)</sup>可见,人口迁移对移旧俗、倡新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注:

冯祖贻估计迁入四川的人口约200万,迁入云南、贵州约100万。参阅《抗战期间内迁人口对西南社会经济的影响》,《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会议论文集》,1995年9月,(台)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主办;何一民估计迁入四川的人口为300万。参阅《抗战时期西南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会议论文集》,1995年9月,(台)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主办。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一,1952),战时迁入陕西的人口约200万,迁入西北其他省市人口据笔者估计在100万左右。

## 参考文献:

- [1] 徐杨.试论抗战时期西南城市民众生活习俗的变迁[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3).
- [2] 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沙坪坝区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3]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4] 李云峰,刘俊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J].西北大学学报,2004,(5).
- [5] 周芷颖.新成都[M].成都:成都复兴书局出版社,1943.
- [6] 张丽萍,郭勇.抗战时期成都华西坝的港澳学子[J].文史杂志,2004,(3).
- [7]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 [8]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648.
- [9] 周勇.重庆通史(第三卷近代史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876.
- [10] 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古镇磁器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03-105.
- [11] 张成浩,莫宏伟.论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观念近代化的影响[J].贵州文史丛刊,2002,(3).
- [12]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 [13]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 [14] 艾萍,王荣环.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意识的变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1).
- [15]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下)[Z].内部资料,1948.1456.
- [16] 朱丹彤.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5).
- [17] 同官县志[O].民国33年铅印本.
- [18] 陈庭珍.抗战以来妇女问题言论集[M].重庆:青年出版社,1945.1.
- [19] 林琼.八年来妇女文化出版工作总结[J].现代妇女,1945,(6).
- [20] 新贵州概况[Z].贵阳:贵阳中央日报出版社,1944.60.
- [21] 重庆市档案馆整理.中国妇运之回顾与瞻望(1940年)[J].档案史料与研究,2002,(1).
- [22]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档案资料丛编·近代云南人口资料[Z].内部印行本,1987.118
- [23] 浦熙修.开发西北声中之西北的妇女[J].现代妇女,1943,(3).
- [24] 梁占梅.中国妇女奋斗史话[M].重庆:建中出版社,1943.118.
- [25] 宋庆龄.中国妇女为自由而战[A].陈庭珍.抗战以来妇女问题言论集[R].重庆:青年出版社,1945.7.
- [26] 朱丹彤,徐晓旭.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市民生活的影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3).
- [27] 重庆旅感录[A]曾智中,尤德彦.张恨水说重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
- [28]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 [29] 李泳河.广西各县概况(民21年度)[Z].南宁:广西民政厅秘书处,1933.

责任编辑:陈红】

# Westward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ts Influence upon the Local Social Life in Western China

ZHANG Gen-fu

(School of Law,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1945)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social life in western China,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life style such as food, clothing and housing, the conspicuous alterations in marital conception and behavior,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women's status, and the gradually weakened regionalism and people got more educated and enlightened.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western China; social